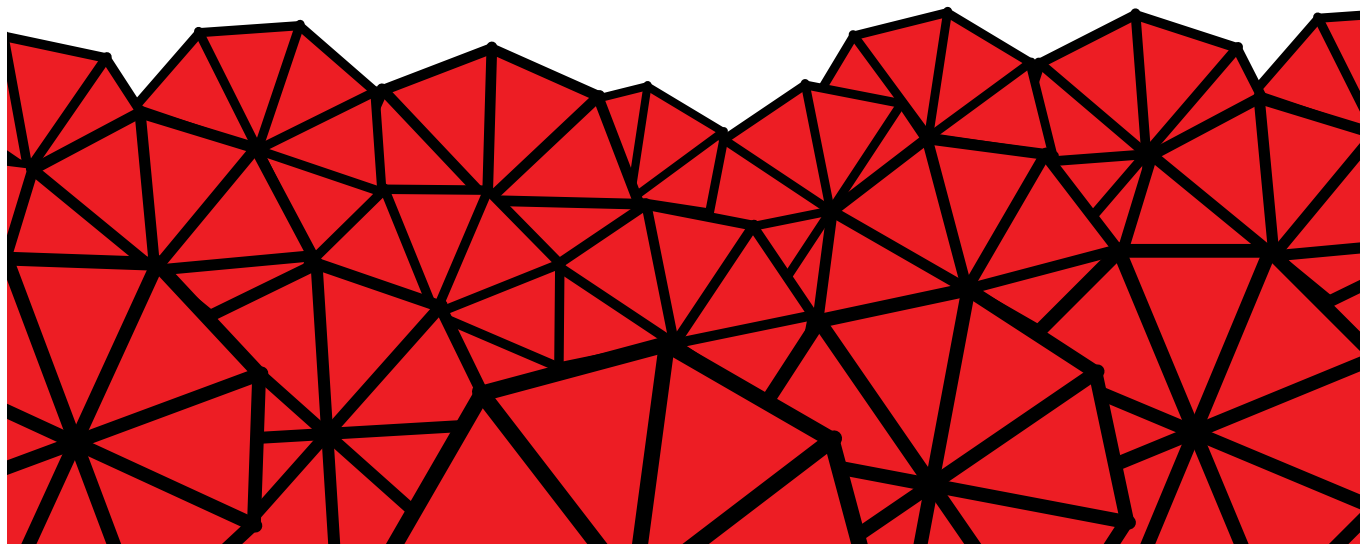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 简报 移徙与性工作



# 移徙与性工作

## 介绍

尽管全球流动呈上升趋势，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媒体上，移徙工人仍然受到污名和消声。此外，在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混为一谈并剥夺性工作者移徙权利的叙事中，移徙性工作者被描绘成受害者或罪犯。为推动更广泛的政治议程，限制移徙并将性工作

…本文探讨了移徙性工作者面临的具  
体挑战，包括缺乏对人权的尊重、法  
律和政策障碍以及缺乏获得服务和支  
持的机会。

定为刑事犯罪，他们的人权往往被忽视。随着政治动荡、气候变化和保守派政府的崛起导致流动性和劳动力迁移增加，本文探讨了移徙性工作者面临的具体挑战，包括缺乏对人权的尊重、法律和政策障碍以及缺乏获得服务和支持的机会。简报面向政策制定者、设计和实施项目并直接与性工作者合作的人。简报可作为工具供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倡导性工作者权利时使用。在全球化经济中，劳工移徙至关重要，但又充满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复杂性，本文将在劳工框架内分析移徙者的性工作。由于激进的反移徙政策和叙事的兴起，这一点现在尤其重要，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COVID-19暴露并加剧了被刑事定罪的关键人群和社群之间的不平等，性工作者正受到日益压迫的立法的影响，例如实施“终止需求”模式，尽管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这种方法对性工作者有害。

## 方法论

本简报基于2022年6月至7月在九个国家进行的深入研究、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全球在线咨询，以及对国际劳工组织、无证移徙者国际合作平台 (PICUM)、全球反对贩运妇女联盟 (GAATW)、一名南非公共卫生研究者和一名驻新加坡法律专家等关键信息人的访谈。并进行了文献综述的桌面研究作为补充。国家顾问使用标准化问卷进行了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内容涉及世界各地移徙性工作者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在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声明》中概述的基本权利方面所处的位置。在秘鲁、尼加拉瓜、加拿大、葡萄牙、民主刚果、坦桑尼亚、澳大利亚、孟加拉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行了国家案例研究，国家顾问与190多名性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焦点小组讨论和访谈。参与者包括女性、男性、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他们跨越国界和地区移徙，有的一开始就计划从事性工作，又的是在抵达后决定从事性工作。他们包括在妓院、按摩院、在线、在自己家里、在街头和娱乐场所工作的人。<sup>1</sup> 参与者包括，国内和跨境的有证和无证移徙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性少数性工作者和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与NSWP成员组织的全球在线咨询中使用了相似问卷，收集了来自14个NSWP成员组织的回复。

本文的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全球移徙性工作全局的文献综述，并包括了与关键信息人讨论所得的见解。本文件的第二部分根据国家顾问的报告和在线咨询的答复，强调了移徙性工作者的主要挑战、动机和应对策略，扩大了移徙性工作者的声音和经验。

1 NSWP, 2013, [关于性工作人权与法律的共识声明](#)

## …迁徙性工作者“受到刑事定罪、污名化和歧视的过度影响，并在服务和支持方面遇到多重障碍”。

## 文献综述

NSWP的2022年战略规划指出，迁徙性工作者“受到刑事定罪、污名化和歧视的过度影响，并在服务和支持方面遇到多重障碍”。<sup>2</sup> NSWP

之前关于迁徙性工作者的简报<sup>3</sup>强调了迁徙性工作者面临刑事定罪、社会排斥和其他阻碍基本权利的情况。NSWP的共识声明确立了让性工作者以安全的方式工作，免受污名的八项基本权利。其中之一是迁徙和移徙权，这是各项国际条约确立和批准的一项基本人权。《共识声明》在劳工框架内理解迁徙和性工作，除其他权利外，还包括性工作者离开自己的国家、申请进入另一个国家以及该申请得到无偏见的处理的权利。它概述了政府和当局为实现这些权利需要采取的几项积极措施。NSWP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其他机构一起开发了性工作者实施工具 (SWIT)，其中包括面向所有合作伙伴的实施全面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项目的国际规范性指南。<sup>4</sup> 这些还包括纳入迁徙性工作者并与之密切合作，要求项目对她们的特殊需要保持敏感，以切实有效。

本文现在试图重新评估全球形势。PICUM证实，最近全球对迁徙者的监视和迫害有所增加，影响性工作者的新法律和政策也更多。例如，在欧盟内部，近年来出台了将迁徙者刑事定罪的立法，并增加了对驱逐出境和拘留措施的投入。<sup>5</sup> 许多欧洲国家也在采取将购买性服务刑事定罪和加强对性工作的监管的途径，这两者都对迁徙性工作者的影响尤为严重。

迁徙者占全球性工作社群的很大一部分。在一些西欧国家，多达70%的性工作者是迁徙者。<sup>6</sup> 在泰国，焦点小组参与者认为这一数字约为30%。南非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主要城市有39%的迁徙性工作者来自其他国家，另有46%来自南非其他地区的国内迁徙者。<sup>7</sup>

GAATW在访谈中指出，性工作者与其他迁徙者有许多相同的迁徙原因，包括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和生活质量，逃避冲突和歧视，以及出于旅行和更多地了解世界的愿望。由于气候变化和持续的政治危机，预计全球迁徙模式也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变化。考虑到这些不断变化的情况，审视迁徙性工作者面临的具体挑战非常重要。

## 排斥、驱逐出境和阻碍权利实现

在寻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迁徙性工作者在实现人权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迁徙性工作者经常发现自己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包括住房和医疗保健，特别是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预防，以及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因为他们是非国民、无证件，或者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根本不知道如何获得这些服务。住房问题也可能是歧视无证迁徙以及惩罚那些被视为从性工作中受益的人的立法的结果。例如，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房东不能在知情的情况下将公寓租给性工作者，否则可能因为允许在他们的场所进行性工作而被起诉。

2 NSWP, 2022, 战略规划2022-2025

3 NSWP, 2017, 简报: 迁徙性工作者

4 世卫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NSWP,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3年, 与性工作者共同实施全面的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项目: 协同干预的实践途径

5 PICUM, 2019, 保障无证迁徙性工作者的人权和尊严

6 TAMPEP, 2019, CEDAW立场文件: 促进欧洲性工作者权利和健康欧洲网络

7 M. Richter 等人, 南非三个城市女性性工作者的移民状况、工作条件和卫生系统利用情况, 移民和少数民族卫生期刊, 16 (2014): 7-17.

由于没有健康保险或现场文件，移民性工作者往往难以获得医疗保健。一些医疗保健机构也可能不确定如何向移民提供服务。<sup>8</sup> 据一位接受本报告采访的南非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称，一些医院已经实施了要求患者在入院前出示公民身份证明的政策。然而，该国在提供更全面的艾滋病毒服务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趋势，医护人员接受了如何满足所有性工作者需求的培训。然而，在坦桑尼亚，一名被诊断感染艾滋病毒的受访者被告知返回其祖国接受治疗——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COVID-19大流行使全球移民性工作者的处境恶化，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应急救济计划或国家社会保护。NSWP的研究<sup>9</sup> 表明，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存在广泛的障碍，公共卫生控制加强，针对性工作者的突袭，难以获得社会保障，驱逐出境增加以及对无家可归的脆弱性。

排斥也延伸到精神卫生服务。那些在刑事定罪或不稳定条件下工作的人更有可能遇到心理健康问题，而且他们所经历的交叉污名加剧了这些问题。由于语言不通和缺乏必要的文件，移民性工作者在获得精神卫生服务方面面临障碍。精神卫生机构往往无法向性工作者提供适当的、无批判的服务，使问题更严重。<sup>10</sup>

## 人口贩运叙事最常伤害性工作者，并破坏性工作者的权利倡导。因为性工作者的移民与人口贩运和性剥削混淆，这种混淆会被反移民政策和社会态度所强化，特别是在全球北方。

人口贩运叙事最常伤害性工作者，并破坏性工作者的权利倡导。因为性工作者的移民与人口贩运和性剥削混淆，这种混淆会被反移民政策和社会态度所强化，特别是在全球北方。<sup>11</sup> 由此产生的立法往往忽视经验数据，并造成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受暴力的环境。<sup>12</sup> 被引用的关于贩运的统计数字也经常具有误导性。<sup>13</sup> 一位南非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指出，据称受害者可以获得的服务实际上可能并不到位。

将性工作与贩运混为一谈，导致性工作者、客户和第三方被刑事定罪，性工作者被排除在基本服务之外，并受到更多的驱逐和管制。<sup>14</sup> 在法国，对采用北欧模式的政治气候的审查发现，街头移民性工作者的能见度提高造成了道德恐慌，过分强调了贩运者的作用。<sup>15</sup> 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和加强对移民控制的政治愿望强化了这种情况。<sup>16</sup> 在加拿大，反人口贩运议程还将大量政府资金重新用于警察和“救援”组织，这导致对移民性工作者的骚扰、监视和驱逐出境。

性工作者受到旅行限制和移民当局歧视的影响尤为严重。系统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跨性别加剧了这种歧视，阻碍了性工作者的行动自由，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限制了他们不受干涉地生活和工作的权利。<sup>17</sup> 被移民当局发现为性工作者的移民者更有可能面临驱逐出境，并可能受到其原籍国以及移民国的家庭或机构的歧视。由于仍然很难通过性工作获得居留或工作许可，性工作者往往被迫处于无证状态，并在隐蔽环境中工作。在瑞典等一些国家，如果涉嫌从事性工作，性工作者将面临被驱逐出境和被拒绝入境的风险。<sup>18</sup> 这导致性工作者更加依赖移民中介，在移民过程中往往会积累巨额债务。<sup>19</sup>

8 NSWP, 2018, 简报: 全民健康覆盖: 把最后一英里放在首位

9 NSWP, 2021, 政策简报: COVID-19与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10 P.G. Maciotti, Giulia Garofalo Geymonat, Nicola Mai, 2021年, 性工作与心理健康: 德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贩运性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政策相关报告

11 ESWA, 2022年, 性工作和种族主义社群报告#1: 反性工作, 反贩运和反移民 (ASWTI) 立法中种族主义的历史概述

12 PICUM, 2019, 保障无证移民性工作者的人权和尊严

13 Asijiki, 2015, 性工作、移民和旅游: Asijiki情况说明

14 NSWP, 2018, 政策简报: 反人口贩运立法和项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15 NSWP, 2011, 简报: 对客户刑事定罪

16 C Calderaro and C Giametta, 卖淫问题: 法国以移民控制、公共秩序和妇女权利为名的镇压政策, 反人口贩运评论 12 (2019): 155-171.

17 NSWP, 2019, 政策简报: 性工作者和旅行限制

18 ESWA, 2022年, 性工作和种族主义社群报告#1: 反性工作, 反贩运和反移民 (ASWTI) 立法中种族主义的历史概述

19 PICUM, 2019, 保障无证移民性工作者的人权和尊严

…在欧盟，被拘留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同时立法趋势减少了移民性工作者可获得的法律援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最不稳定的移民者。

新的立法和反移民的态度反映了伤害移民性工作者的全球趋势，往往得到保守派政客的支持。区域网络拉丁美洲性工作者平台 (PLAPERTS) 报告说，厄瓜多尔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迅速驱逐无证移民。PICUM指出，在欧盟，被拘留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同时立法趋势减少了移民性工作者可获得的法律援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最不稳定的移民者。监控的增加过度影响了性工作者，例如计划实施的欧洲跨境共享警察情报数据库，这可能会影响与正规化有关的决策。<sup>20</sup> 在荷兰，计划中的改革包括要求性工作者进行登记，但不包括“非正规”性工作者和持有非荷兰工作许可证的性工作者。在西班牙，拟议的《废除卖淫法》采用“终止需求”途径，将剥夺性工作者的自愿权利，并将危及性工作者获得住房和安全工作空间的权利。<sup>21</sup>

从稍微积极的方面来看，欧盟层面最近的政策变化试图认识到无证移民者更容易受到犯罪影响并与执法部门出现负面互动。一些国家也开始承认性工作者的权利，例如印度最高法院最近裁定性工作者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然而，这一决定仍然存在争议，并受到主要来自警方的强烈反对。<sup>22</sup>

## 三重污名

回应在线咨询的性工作者证实，污名和歧视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安全和自尊，并影响了他们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污名多被描述为来自许多方面。津巴布韦所有妇女倡导组织 (AWA) 的受访者将移民性工作者描述为遭受“性工作者，外国人和 (通常) 没有身份证件”的三重污名。民主刚果的性工作者指出，来自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移民性工作者面临来自当地同事的暴力威胁，认为他们是竞争者，是物价下跌的原因。在秘鲁，委内瑞拉移民者报告说遭到袭击并被赶出公园。在尼泊尔，Jagriti Mahila Maha Sangh (JMMS) 报告说，被驱逐的移民性工作者几乎不可能找到住房。在坦桑尼亚，性工作者，特别是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移民性工作者，被视为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并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宗教领袖的歧视。吉尔吉斯斯坦的Tais Plus反映了执法部门挑出无证移民者，使他们面临身份检查和勒索事件增加的问题。在孟加拉国，性工作者面临来自准军事团体、诊所机构和“救援”组织的污名和暴力，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逃避污名和歧视造成的暴力被认为是移民到国外工作的动机。Tais Plus还指出，在内政部于2016年发起对城市性工作者的“清洗”之后，性工作者开始离开该国。

除了面临暴力和社会排斥的威胁外，津巴布韦的AWA和北马其顿的STAR都报告说，污名导致移民性工作者尽可能匿名地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工作，这使得很难在他们之间建立关系，或者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其他支持网络建立关系。即使在性工作受到管制或免除定罪的国家，移民性工作者也报告说，污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生活。

**“他们的家庭挣扎求生，因为他们面临孤立和经济压力。他们生活在没有承认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福利和法律支持，他们完全依靠同伴的信息和支持”。**

—猩红联盟，澳大利亚

20 PICUM, 取消使用大数据驱逐出境, PICUM博客, 2022.

21 NSWP, 2022, 就修改《西班牙刑法典》的立法提案致首相、西班牙政府和众议院所有政党领导人的公开信

22 NSWP, 2022, 印度性工作者庆祝最高法院承认性工作为性工作的裁决

污名有时来自那些最应该帮助移徙性工作者获得基本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的人。PLAPERTS反映, 移徙性工作者在大流行期间寻求产前护理时面临来自医疗保健官员的暴力。在葡萄牙, 移徙性工作者反映, 社会工作者的恐妓症和将性工作视为罪犯的观念, 意味着性工作者不太可能寻求社会保障和相关紧急支持。在加拿大, 移徙性工作者担心来自其社群的污名和恐妓症, 迫使他们陷入孤立。然而, 当他们能够接触到性工作主导组织时, 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立, 并且能够更好地获得重要的法律信息。

## 移徙的拉动因素

移徙性工作者往往被结构性不平等以及逃避国家失败的冲动驱使而移徙。秘鲁、厄瓜多尔和特立尼达的受访者包括许多委内瑞拉妇女, 是因政治动荡和基本服务崩溃而移徙的。正如喀麦隆受访者所报告的那样, 流动也可能是在国内的, 离开了武装冲突导致不稳定的地区。

雅典红雨伞和SXA-Info (奥地利) 反映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移徙者是希望生活在一个可以更自由地表达性别认同的国家。墨西哥的跨性别性工作者经常寻求庇护, 逃离在原籍国所受歧视。乌干达性工作主导组织网络 (UNESO) 指出, 性少数人群在国内流动, 一个因素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环境, 还有是为了逃离恐妓症带来的袭击。性别歧视等问题也是影响了移徙者选择性工作的原因。欧洲性工作权利联盟 (ESWA) 指出, 根深蒂固的恐跨性别的社会观念, 意味着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的就业机会比一般人群更有限。

## 自由选择工作

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新西兰的受访者报告说, 他们移徙的目的就是从事性工作。来自澳大利亚, 泰国, 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受访者在抵达东道国后决定从事性工作, 因为他们发现性工作是他们作为移徙者最有利可图的选择, 并且比其他行业剥削更少。就秘鲁和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移徙者而言, 大多数人以前曾在性行业之外行业工作, 但发现他们无法在国外找到类似的工作。在奥地利, 人们发现由于缺乏德语知识, 获得其他就业机会受到限制。来自加拿大的受访者指出, 客户能够向他们提供援助, 例如额外的资金和社会支持, 这是在其他部门工作的移徙者无法获得的。

在接受调查的几乎每个地区, 移徙性工作者都报告说, 他们搬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寻求经济机会。在南非、乌干达和津巴布韦, 移徙性工作者的流动往往与采矿业有关, 采矿业吸引移徙者并成为客户来源。同样, 在尼加拉瓜和坦桑尼亚, 性工作者的流动与采矿和农业工人的流动有关。在巴尔干地区 (STAR), 性工作者在夏季季节性迁移到北马其顿, 其他季节性工人也是如此。移徙性工作者也有动力去旅行, 只是为了看世界, 体验不同的文化, 正如泰国Empower的性工作者所强调的那样。

**“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 我们都会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移徙。但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们是敢于并想知道新事物的人.....我们这些做性工作的人格格外大胆!”**

——移徙性工作者, 泰国

**在接受调查的几乎每个地区, 移徙性工作者都报告说, 他们搬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寻求经济机会。**

## 性工作者与边境线

移徙性工作者经常想方设法绕过边境限制，并利用一些边界的流动性。在孟加拉和新加坡，移徙性工作者通过在酒店和娱乐场所短期担任歌手、女服务员和女招待来获得签证。在泰国，Empower报告说，移徙者被禁止参与性行业，但可以在娱乐场所找到女佣和劳工的工作。据新加坡X项目的法律专家称，许多移徙者最初并不是为了从事性工作而来的，但往往会偶尔做性工作以继续赚钱。GAATW指出，虽然有某种形式的申报工作可以帮助移徙者获得一些安全福利，但他们也可能遇到管理人员利用他们对某些权利的无知而滥用合同和盗窃工资。

其他移徙性工作者则通过秘密途径移动。在津巴布韦和民主刚果，性工作者与长途卡车司机一起跨境，而长途卡车司机往往是客户。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来自委内瑞拉的移徙者通过偏远地区的小路步行以逃避检测。许多在厄瓜多尔边境遇到边防警卫的妇女报告说，她们遭到边防警卫的性剥削、勒索和强奸。

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对性工作进行管制的国家，无论是免除定罪还是合法化，都不允许移徙者进入该国从事性工作。在新西兰，性工作只

**在希腊，性工作者必须获得执照，而如果不首先拥有社会安全号码就不可能有执照。这实际上禁止移徙者合法从事性工作。**

对永久居民和公民免除定罪。没有居留权的移徙者如果被发现从事性工作，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在希腊，性工作者必须获得执照，而如果不首先拥有社会安全号码就不可能有执照。这实际上禁止移徙者合法从事性工作。在加拿大，移徙者被禁止从事性产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最近发起了针对加拿大性工作法的宪法挑战，并希望为移徙者、原住民、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

在大多数国家，移徙者不可能以找到性工作为由使其居留合法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性工作者被曝光会损害他们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机会，或导致他们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再次入境。ESWA反映，西班牙和瑞典的性工作者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两个国家，曾从事性工作的警方记录被用作拒绝获得正规身份的理由。澳大利亚是一个例外，一些性工作者能够在伴侣的支持下获得居留权，但在边境面临其他入境障碍：

“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们的伴侣的支持，声明他们已经承认自己是性工作者，性工作对他们的婚姻没有影响。然而，一些性工作者被拒绝进入澳大利亚，因为当局在行李中发现了一些避孕套，在另一起案件中，他们的手机上有关于伴游/性工作的聊天记录。”

——猩红联盟，澳大利亚

迁徙者还利用某些边境法规的放宽，在另一个国家临时或永久居留和工作。在许多情况下，这让他们能够从性工作中赚钱，被家乡社群曝光的风险较小。例如，宽松的边境让性工作者从尼泊尔迁移到印度，在那里他们可以收取更高的价格，而且搬到另一个国家可获得更多的匿名性和自由裁量权。受访者表示，选择迁徙澳大利亚是因为获得工作签证相对容易（尽管很少有人迁徙是为了从事性工作）。来自民主刚果的受访者报告说，他们利用旅行许可证，该证件允许来自东非大湖地区不同国家的国民在另一个国家停留长达三个月而无需支付签证费用。

**“我是卢旺达人，但我装成刚果人 (Munyamulenge)，因为这里有許多卢旺达人持有刚果身份证。同时，我有一张卢旺达身份证，这使我可以在不透露身份的情况下在这两个国家自由行动。”**

——迁徙性工作者，民主刚果

## 移民机构的角色

孟加拉的性工作者反映，移民机构对于迪拜、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性工作至关重要。在选拔流程之后，机构负责所有旅行证件、航班和住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他们通过承诺每月高额报酬来吸引性工作者。这些机构可能会履行与性工作者的协议，但是，一些受访者也反映说他们的报酬低于承诺。澳大利亚的受访者指出，语言困难以及签证申请流程的变化促使他们（错误地）支付那些声称已在澳大利亚登记的

**其中许多机构是骗局，他们签发虚假文件，导致迁徙性工作者的签证申请被拒绝。向这些中介付款也意味着迁徙性工作者甚至在抵达之前就要负债累累。**

的移民机构的服务费用。其中许多机构是骗局，他们签发虚假文件，导致迁徙性工作者的签证申请被拒绝。向这些中介付款也意味着迁徙性工作者甚至在抵达之前就要负债累累。

使用移民机构的迁徙性工作者表示有时在工作场所的谈判能力较低。玻利维亚的迁徙性工作者表示，她们被迫工作时间更长，并指出，由于她们的迁徙身份，她们需要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经常支持和对当局进行干预。在许多案例中，第三方和其他人利用迁徙的无证或秘密身份进行剥削。津巴布韦的AWA报告说，由于无法获得基本服务，也无法得到政府的保护，导致性工作者依赖“妈妈桑”的有偿保护。



## 执法挑战

移民性工作者反映，他们与执法和司法系统的关系非常消极，特别是在与警察的互动中。这必须归咎于性工作被刑事定罪、腐败和对移民特别是无证移民者的迫害。在所有案件中，基本上她们作为移民性工作者的身份都成为伸张正义的障碍。

关于敲诈勒索和索贿的报告很普遍，希腊、秘鲁和乌干达的移民性工作者反映曾被迫行贿。在北马其顿、玻利维亚和津巴布韦，警察敲诈勒索也延伸到对性服务的需求。<sup>23</sup> 在坦桑尼亚，通过非法越境入境的移民性工作者经常被关押，可能面临长达6年的监禁。

由于被刑事定罪和缺乏证件，许多国家参加我们咨询的移民性工作者表示，由于害怕骚扰、逮捕、驱逐出境或当局干脆拒绝接受举报，她们

…由于害怕骚扰、逮捕、驱逐出境或当局干脆拒绝接受举报，她们无法报告针对自身的暴力、强奸或犯罪。

无法报告针对自身的暴力、强奸或犯罪。加拿大已通过省级法律，允许加强警方对性工作者的监视和数据收集，损害他们的隐私权。加拿大警方还与反人口贩运组织密切合作，导致移民性工作者担心如果举报暴力事件就会被驱逐出境。

在某些情况下，举报暴力事件会给整个性工作者群体带来负面影响。

“一名移民性工作者在南岛北部的一个小镇被强奸，尽管受害者要求不要报警，汽车旅馆经营者还是报了警。强奸受害者觉得她被胁迫向警方报案，在法庭上充当证人……在此期间，NZPC为强奸受害者提供大量帮助。然而，在强奸犯被判刑后的几天内，新西兰移民局（在警察的陪同下）突袭了南岛北部的妓院、汽车旅馆和酒店，并驱逐了一些性工作者。这一行动向其他性工作者表明，警方和新西兰移民局紧密合作。”

——新西兰性工作者集体 (NZPC)

移民性工作者对自身权利缺乏了解，语言障碍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JMMS发现迫切需要针对移民性工作者的项目，教育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可利用的法律手段。Empower进一步表示：

“我们需要很多技能来应对执法。我们必须研究不同的制服和徽章，以了解他们在调查什么以及他们拥有什么权力。我们必须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调情，什么时候该跑！我们的雇主用我们的一些收入定期给执法人员钱……！”

——移民性工作者，泰国

缺乏执法部门的保护与暴力和伤害的增加密切相关。泰国的性工作者报告说，移民者经常成为暴力客户的目标，他们知道暴力不会被报告。喀麦隆、葡萄牙、厄瓜多尔和津巴布韦的移民性工作者表示，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接受不安全的做法，包括无保护的性行为以及较低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警察显然对移民性工作者构成威胁，而不是为移民性工作者提供法律保护。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和再教育，以确保移民性工作者的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

23 NSWP, 2020, 简报: 性工作者缺乏诉诸司法的机会

## COVID19大流行对迁徙性工作者的影响

COVID-19大流行以及自2020年以来的封锁措施加剧了不平等，并对被刑事定罪和边缘化的人群，特别是所有性工作者产生了极大影响。迁徙性工作者也不例外，大多数咨询受访者报告说，她们的情况总体上更糟。UNESO总结了大流行对性工作者造成的一些后果：

**“封锁措施.....影响了她们寻求保健服务，特别是艾滋病毒预防和治疗、堕胎后护理。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迁移和寻求更好的生活水平、更高收入和法律支持的需求。此外，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重新唤醒并引发了我们社群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了所有精神压力源，如压力，焦虑和抑郁，从而影响了我们迁徙性工作者毒品和物质使用的增加。”**

性工作者还反映，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污名和歧视有所增加。澳大利亚的亚裔性工作者说，他们被视为COVID-19的携带者，并经常受到辱骂。ESWA报告说，在封锁期间返回家园的迁徙者被指控携带病毒。这些经历呼应了人们对性工作者是“疾病媒介”的普遍误解。

**由于迁徙性工作者的无身份证，而且缺乏对性工作是工作的法律承认，她们经常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应急响应和国家社会保护机制之外。**

由于迁徙性工作者的无身份证，而且缺乏对性工作是工作的法律承认，她们经常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应急响应和国家社会保护机制之外。在葡萄牙，需要社会工作者的认可才能进入食物银行，

而性工作者的申请往往因歧视而被社会工作者拒绝。奥地利和津巴布韦的迁徙性工作者报告说，在疫情期间，身份检查和随后的驱逐出境数量普遍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旅行限制，其他迁徙性工作者在封锁期间无法返回祖国，也无法获得家庭支持。

**“我曾经在酒店里跳舞.....我的收入很好，我在孟加拉裔兄弟(经纪人)的指导下工作.....当COVID-19开始时，我决定住在酒店，那里有一些我的客户.....2020年9月，我怀孕了，怀孕4个月时，我的经纪人离开了我，不再和我沟通。根据迪拜的法律，婚外怀孕是非法的。有一天，警察来到我的房间，把我带到警察局。我无法与任何人沟通，也无法聘请律师，所以我不得不进监狱。我的孩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

——迁徙性工作者，孟加拉

泰国和墨西哥的迁徙性工作者谈到了他们与关闭妓院、酒吧和娱乐场所的斗争，因为这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特立尼达，在高峰时段对街头工作者实行晚间宵禁，对迁徙性工作者的影响尤其严重。性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在自己的家中活动，使她们面临新的潜在暴力。吉尔吉斯斯坦的迁徙性工作者在封锁期间无法工作足够的时间，积累了大量个人债务。自封锁措施放松以来，迁徙性工作者不得不优先偿还这笔债务，导致长期的财务不安全。尽管封锁措施增加了性工作的犯罪率，但由于缺乏国家支持或经济替代方案，大多数国家的性工作者继续直接与客户合作。

**“起初，我没有工作。我不想冒险。但许多女孩不得不去，因为她们别无选择：要么工作，要么饿死。然后时间过去了，我回来了。客户减少了很多，每个人都很害怕，警察总是盯着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土匪一样。”**

——迁徙性工作者，葡萄牙

性工作者被迫在保护自己的健康或能够满足其基本需求之间做出选择。他们的健康也因卫生服务的关闭而受到损害，如墨西哥的减低伤害服务和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检测设施关闭等。在特立尼达，感染艾滋病毒的迁徙性工作者发现很难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厄瓜多尔和尼泊尔，迁徙性工作者无法前往医院，而秘鲁和津巴布韦的口罩和COVID-19检测等预防物资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在葡萄牙，迁徙性工作者在卫生服务机构注册时遇到障碍，难以获得COVID-19疫苗。

尽管大流行对性工作者产生了压倒性的负面影响，但也有一些积极发展的小例子。在特立尼达，一名迁徙性工作者指出，OnlyFans平台在大流行期间帮助她获得收入，并提供一种新的工作方式。

**…迁徙性工作者在卫生服务机构注册时遇到障碍，难以获得COVID-19疫苗。**

## 社群与行动

任何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都很难与迁徙性工作者建立有效关系或提供适当的支持。由于缺乏资金来满足迁徙性工作者的需求，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然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可以为迁徙性工作者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寻求支持，而不必担心受到评判或排斥。PLAPERTS表示，他们的目标是为迁徙者和当地人提供全面的服务。Rosas Mujures de Lucha (秘鲁) 表示，他们打算这样做，但需要更多的支持，特别是来自政府的支持。AWA (津巴布韦) 列举了与南部非洲同事一起开发区域平台的过程，该平台将更好地支持迁徙性工作者。

## 建议

- 1 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倡导者必须积极努力，实现性工作的全面免除定罪，包括性工作者、客户和第三方。
- 2 性工作必须被承认为工作，性工作者必须被赋予与其他工作者相同的移徙权利，为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合法和平等的移徙渠道，以获得性工作或其他工作的工作签证。
- 3 停止将人口贩运、性工作和移徙混为一谈的反人口贩运对策，或侧重于根除性工作行业的对策。这些不利于识别人口贩运受害者，并增加了移徙和所有性工作者所遭受的伤害。
- 4 性工作者必须被纳入国家社会保护机制，包括健康和保险、病假工资和其他应急措施。
- 5 审查不公平的歧视性工作者的移徙法律和政策，并取消因性工作历史而禁止性工作者进入任何国家的旅行限制。
- 6 删除明确禁止移徙者参与性产业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实际造成了他们对第三方的依赖。
- 7 在社会保护/卫生服务与移民当局之间建立防火墙，确保移徙性工作者能够获得服务并报告虐待行为。
- 8 提高社会和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执法官员的意识，为本国和移徙性工作者提供无批判的保密的服务，并以多种语言提供这些服务。
- 9 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提供充足的资金，这些组织最适合为移徙性工作者提供全面、无批判和量身定制的服务，从医疗保健到住房，包括报告侵犯人权行为。
- 10 让移徙性工作者参与服务和信息的开发和提供，以确保所提供的服务及其提供方式是针对性的、尊重的和有效的。

## 结论

移徙性工作者的需求是交叉的。他们遭受多层次的污名和歧视，包括系统性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污名、额外的刑事定罪和加剧的结构性障碍。移徙性工作者的边缘化加剧了这种情况，使他们与性工作主导

组织和网络建立联系变得更加困难。语言障碍增加了边缘化和社会孤立的可能性。全球突发卫生事件和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如COVID-19）将他们排除在应急响应和国家社会保护机制之外，从而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移徙性工作者足智多谋，他们通过交际、适应和谈判来应对日益敌对的边境管制。必须改进政策和项目，以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

**移徙性工作者足智多谋，他们通过交际、适应和谈判来应对日益敌对的边境管制。必须改进政策和项目，以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 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 包括但不限于: 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 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 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18-29岁之间); 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 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 残障性工作者; 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Mitchell House, 5/5 Mitchell Street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7BD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http://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 SC349355

项目支持:

